

旷世大儒——二程

徐洪兴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旷世大儒——二程

徐洪兴◎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二程/徐洪兴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6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708-9

I. 旷… II. 徐… III. ①程颢 (1032~1085)-传记②程颐 (1033~1107)-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485 号

-
- | | |
|-------|----------|
| 丛 书 题 | 旷世大儒 |
| 书 名 | 旷世大儒——二程 |
| 作 者 | 徐洪兴 著 |
| 责任编辑 | 李大星 |
| 美术编辑 | 马少华 |
| 封扉设计 | 李颖明 |
| 责任校对 | 张三铁 |
-
- | | |
|------|--------------------------------------|
| 出版发行 |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8.5 |
| 字 数 | 200000 |
| 版 次 |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6000 |
| 书 号 | ISBN 7-202-02708-9/K·667 |
| 定 价 | 13.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了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有说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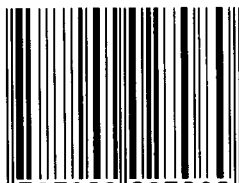
编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黄任编辑
封扉设计
美术编辑
黄任校对

李人星
李颖明
马少华
张三铁

ISBN 7-202-02708-9



9 787202 027080 >

ISBN 7-202-02708 9
K·667 定价:13.8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时代氛围	[4]
一、右文抑武	[4]
二、积贫积弱	[12]
第二章 家世生平	[18]
一、世宦人家	[18]
二、大程伯淳	[26]
(一) 初任地方官	[28]
(二) 京官任上	[38]
(三) 再任地方官及居洛 讲学	[47]
三、小程正叔	[56]
(一) 处士时期	[57]
(二) 帝师始末	[62]
(三) 苍凉晚境	[75]
第三章 思想学说	[82]
一、学术背景	[83]
(一) 儒学中衰	[83]
(二) 儒学更新	[90]
(三) 先驱人物	[93]

(四) 师友之间	[102]
二、天理观念	[108]
(一) “理”之渊源	[109]
(二) 天下一理	[112]
(三) 理无增损	[114]
(四) 理一分殊	[115]
(五) 形上形下	[117]
(六) 天理自然	[120]
(七) 理必有对	[122]
三、伦理学说	[124]
(一) 价值之源	[124]
(二) 仁之本体	[132]
(三) 礼乐本体	[141]
四、心性理论	[145]
(一) 性即理也	[146]
(二) 善·恶·性·才	[150]
(三) 道心人心	[160]
五、修养工夫	[170]
(一) 定性识仁	[170]
(二) 主敬集义	[179]
(三) 格物穷理	[187]
(四) 孔颜乐处	[194]
六、论衡诸家	[201]
(一) 批判佛道	[202]
(二) 论衡“关学”	[210]
(三) 论衡“象数”	[215]
(四) 批判“新学”	[219]

第四章 学派影响	[226]
一、二程异同	[226]
(一) “气象”之异	[227]
(二) 思想之异	[232]
二、程门高足	[243]
三、后世流变	[250]
二程年表	[257]
主要参考书目	[263]

引 子

公元九六七年，时当宋太祖乾德五年，以干支纪年的话则为丁卯岁。这一年的三月（阴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如连珠一般地集聚于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白虎）中之奎、娄之间的天区^①。

“五星连珠”这一奇特天文现象的出现，自然会引来重视星相观察的中国人之关注。一般按中国古代的占星术来说，“五星连珠”是一个好的兆头。就这一天象出现的当时而言，正值北宋王朝建立后不久，在历经了唐末五代近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之后，老百姓们都盼望着能过上太太平平的日子。于是深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道的推步星历家，就把它的预兆说成是：

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②

这以后，在宋真宗的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仁宗的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星又分别有二次会聚。这多次的五星

① 《宋史·天文志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引同）。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引同）。

会聚给后人提供了许多解释“天意”的可能性，尤其是那首次的“五星聚奎”，就不再仅仅是所谓“天下太平”之意了。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占星术的说法，奎星主文章，引申为主文明之运，易言之，“五星聚奎”预示着文运当行。而后来写思想学术史的人，就把北宋初年的“五星聚奎”，说成是预兆将诞生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这“北宋五子”，而他们五人，则是开启中国历史上七百余年理学思潮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五个哲学家。清初的黄百家，在补修其父亲黄宗羲未完成的断代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中，曾数次提及此事。如在《百源（邵雍）学案》中说：

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①

在《明道（程颢）学案》中他又说：

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②

在上面所提到的周、程、张、邵这“北宋五子”中，通常的观点认为程颢和程颐兄弟是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这也是过去学术界所公认的，旧时的说法就是“五星聚奎，伊洛鍾秀”，这里的“伊洛”，是指伊河与洛河，亦即寓指由二程兄弟所开创的“洛

① 《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引同）。

② 《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

学”，即后来朱熹所谓的“伊洛渊源”^①。

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和视野来看的话，用“五星聚奎”这种占星术的比附，来说明北宋理学的崛起，颇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因而是不足凭信的；但如果就北宋时期理学的实际奠基及形成过程而言，我们还必须承认，二程兄弟的作用确实是没有人能与之相颉颃的：他们开创了北宋的“洛学”；系统提出或阐释了宋明理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范畴或命题；在儒家哲学上确立了“理”本体论；把自先秦孔子、孟子、荀子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并光大；他们还直接开启了理学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两大体系。所以，称二程兄弟为“旷世大儒”是毫不过分的。

① 按：朱熹著有《伊洛渊源录》一书，是理学史的开创之作，共四十卷，专论北宋以来理学传承演变的源流。书中把二程的“洛学”推为理学正宗，不仅记载二程思想为最详，且身列程门的历代弟子，即使言行无甚大影响者，亦具录其姓名。

第一章 时代氛围

二程兄弟生活的北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这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社会、文化上讲，都是如此。而二程兄弟之所以能在儒家哲学上建树过人，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渊源有许多关联，而且也与他们所生活着的时代息息相连。所以，在叙述二程其人其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待一下他们二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当然，这一交待不会如一般史学著作那样面面俱到，我们主要还是就与本书主题有关的背景稍加叙述而已。

一、右文抑武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的阴历正月初一，小朝廷的君臣们正在忙着过年。突然，接到了来自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州）边关的报告，说北汉的军队与契丹人联合，正向后周的边境入侵。这时，后周的小皇帝柴宗训才七岁，浑然不知事情的缓急真伪；而其母亲符太后年轻新寡，于政务、军务则一窍不通。于是，如何应付这一突发的事件，全由当时的宰相范质来定夺了。而作为一介书生的范质，对边境的实际情况所知极其有限。仓促之间，他就向符太后推荐了当时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让他率军北上御敌。当后周大军行到离首都汴京（今河南开

封)东北仅二十公里处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部队就安营扎寨了。翌日的黎明时分,赵匡胤手下的将领们把早已准备好了的、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黄色龙袍,披到了喝酒装醉的赵匡胤身上。于是“入侵”的敌军也不知何处去了,而赵匡胤却以皇帝的身份返回汴京,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宋太祖赵匡胤起于介胄之伍,就如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的,是一个“权不重,望不隆,学不夙,恩不洽”的人,但他的脑子却比较清醒。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赵匡胤深知:自五代以来,各割据政权的内部斗争完全是由军事实力派支配的,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里,中原地区的朝代如走马灯似地换了五次,而皇位也像轮流坐庄那样改了八姓,这一切说到底,无不以军权的得失为转移的。就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言,他之所以能够从孤儿寡母手中轻易地夺得皇位,也只是一个纯属偶然的时机,得以取代张永德而成为后周的殿前都检点(最高军事长官),就此控制了国家的军权。因此,如何才能确保甫建的赵宋王朝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似翻鳌上饼”那样恶性循环的故辙,进而根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中之“怪圈”?这一问题,也就成为赵匡胤在着手其政权建设时的最主要的着眼点之所在。

在宰相赵普的协助下,赵匡胤决心“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王夫之语)。他为了达到保住新王朝的目的,甚至做出了不让儿子而让兄弟继承皇位的重大“牺牲”。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确立起了“兴文教,抑武事”这一最基本的国策。由此,又引出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措施、方法或制度,其中的种种具体内容,限于本书的主题,这里就省略不述了。而此一基本国策,以后便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历代皇帝都遵行不悖,尽管他们

之间在施行此一基本国策的程度和方法上或有不同。总之，宋太祖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又顺应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个建立新王朝的规律，很快就由崇尚武力的一介武夫，变为尊儒重文的君主。而以后的嗣君，也大多成为“锐意修文”、“好读书”、“性好艺文”的皇帝。

宋初“兴文教”的结果，使得大批读书人得以跻身于社会的上层，成为赵宋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所受待遇之优渥，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用。文臣治国照理应是常事，但在宋代，这一现象却特别突出，上自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下到知州、知县，包括经略安抚使之类的武职官员，基本上多由文人充任。北宋中期的蔡襄曾这样概括宋廷的用人政策：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①

甚至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北宋名将，也往往要折节读书，留意于斯文。个中之因实不难索解，因为倘若你纯粹是个武人的话，就将会受到朝野的普遍小觑。如名将狄青，他以卓著的成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枢密使，但他的名望与身分却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其原因何在？狄青心里非常明白，他自己对别人说过：

^① 蔡襄《蔡忠惠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